

只能让人发笑,这不是真正的动物园

■ 玉渊杂谭

张盖伦

近日,保定动物园凭借着其“神奇”的展出动物在众多“土味魔幻动物园”中“C位出道”。有网友在微博上表示,保定动物园养了一大堆麻鸭和甲鱼,兔子能在园区内跑,鸡鸭成群跑,颇有种田园农家乐的意思。

这种风格不是独一份。之前被网友吐槽过的,还有广西玉林的“龟山动物园”。这家动物园脑洞大开,展出了一只“招财长寿龟”。动物园里还有企

鹅区,但“企鹅”全部是气球,乖巧地颤巍巍地站在水泥地上。

这些所谓的奇葩动物园,只是挂了个“动物园”的名号。如果找些家禽家畜,弄些木雕、气球,搞些莫名其妙的小型表演,就说是动物园,这门槛未免也太低了。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“魔幻”动物园成了一些人的快乐源泉,但老实说,它们顶多能叫旅游景点。

住建部有文件专门对动物园下了定义,说它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示范场所,是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,中心任务是开展野生动物综合保护和科学研究,并对公众进行科普教育和环境保护宣传。

现代动物园两大重要职能,一为保育,二为教育。再来看看前文所说的魔幻动物园。养一群鸡鸭鹅,和野生动物综合保护好像不搭界;拿一只电说是“长寿招财龟”,动物病恹恹懒洋洋地趴在笼子里,也很难教育出什么。公众来到这些动物园,也许能哈哈大笑,但内心能有多大触动,能不能由此生出“尊重自然、保护自然”的想法,得打上一个大写加粗的问号。还有一点,动物园有社会公共服务功能和公益性特点,但这些“魔幻”动物园,更像是借着动物的幌子去圈钱,不地道。

其实,可以理解中小城市动物园的发展困境。毕竟,缺钱、缺地、也缺专业人才。但动物园也不用非得

长成一副模样。每个地区、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野生动物。如果财力不够,也不必非要买来狮子老虎撑门面,本地的鸟类和兽类,同样能做文章。笔者曾去过日本一座小城的水族馆,以展出水母为主,并在不同时段安排专人进行水母知识授课。场馆虽小,却也尽职尽责地履行了保育和教育的功能。

其实,小城市的动物园,也是城市里重要的休闲旅游去处和科普教育场所。它不该被荒废,教育功能也不应被搁置。用心、园方也能借助VR等多样化的科技手段,让动物园为公众讲述一出以自然保育为主题的故事。故事的作用,不应只是逗人发笑。

■ 岁时记

何以消烦暑

谢君



时下小暑已过,渐近大暑,正值一年中最炎热的伏天时节。滚滚热浪,把人逼退于封闭的空调房中不敢出门。隔窗遥望,暑热蒸腾,我们是否会纳闷,在没有空调和电风扇的古代,人们要如何度过难熬的炎夏?事实上,古人们的纳凉方式一点也不比今天少,有的甚至还足以令今天生活在都市里的我们艳羡不已。

烈日炎炎,最痛快的消暑方式可能就是喝冰镇饮料了。古代虽然没有制冰的技术,但古人也可以在夏天吃到冰镇饮品。两千多年前的《诗经》里就有描写夏天用冰块纳凉的诗句。《诗经·邶风·七月》写道:“二之日凿冰冲冲,三之日纳于凌阴。”人们将冬天里的冰块储存进冰窖,等到夏天再拿出消暑。这冰可放在室内作降温之用,也可用来调制凉饮。屈原在《招魂》中写道:“挫糟冻饮,耐清凉些。华酌既冻,有琼浆些。”这冰镇的甜酒,在酷暑季节无论是人还是对鬼魂都有无限吸引力。古代甚至有类似今天冰箱的设备,只不过里边的冰块都是冬天储存下来的。当然这种消暑方式最初只有贵族才有资格享用,直到明清时,用冰块避暑才进入寻常百姓家。

对于古代诗人来说,也许最有诗意的纳凉方式就是住进山林中的古寺。那里有深山、有浓阴、有溪水、有凉风,更有悠闲的时光。比如中唐的韦应物《精舍纳凉》诗,描写的就是诗人在深山寺庙里纳凉的情景:“山景寂已晦,野寺变苍苍。夕风吹高殿,露叶散林光。清钟始戒夜,幽禽尚归翔。谁复掩扉卧,不咏南轩凉。”深山之中,满眼苍翠,幽静的野寺,清脆的钟声,山风习习,开窗而卧,足以让人忘了此时是夏天。北宋诗人梅尧臣也喜欢去寺庙避暑,他在《中伏日陪二通判妙觉寺避暑》一诗中写道:“高树秋声早,长廊暑气清。不须河朔饮,煮茗自忘归。”山林之中的清幽古寺,暑气比外边要弱得多。在这样的寺庙里,不需到北方去酣饮避暑,在此地喝点茶就足以解暑了。

去深山古寺避暑,对古人来说也不容易。所以古人更多时候还是在山中避暑。有条件的私家建有专供夏天纳凉的亭榭。这样的亭榭一般都建在水池边,池中植有荷花,养着金鳞。盛唐诗人孟浩然在《夏日南亭怀辛大》一诗中写自己在亭榭里纳凉的情景:“山光忽西落,池水渐东上。散发乘夕凉,开轩卧闲敞。荷风送香气,竹露滴清响。欲取清露饮,不知何处取。感此怀故人,中宵劳梦想。”诗人披散着头发,打开门窗,任傍晚的风将清香的荷花香气送入室内,竹林的清幽也有助于消解暑热,纳凉,弹着琴,想起远方的朋友。唐末高骈的《山亭夏日》诗,写的也是在池塘边的凉亭纳凉的场景:“绿树阴浓夏日长,楼台倒影入池塘。水晶帘动微风起,满架蔷薇一院香。”

为了让亭榭更解暑,有些富贵人家会在亭榭顶上建有装冷水的冰窖,让冷水从亭子的顶檐四周流下,形成雨帘,从而很好地起到降温效果。这样的亭子叫水亭。中唐诗人刘禹锡有一次在刘驎马府邸的水亭避暑,就体会到了水亭的妙处:“千竿竹翠数莲红,水阁凉生玉簟空。琥珀盘红疑瀉酒,水晶帘莹更通风。赐冰满碗沉朱实,法馔盈盘覆碧笼。尽日逍遥避烦暑,再三珍重主人翁。”水亭翠竹红莲环绕,挂着水晶帘,铺着竹席,人们喝着美酒,品尝着佳肴和冰镇的水果,真是太舒适、太奢侈了。

纳凉要有好的去处也要有好的心境。一生修佛的唐代诗人王维给我们展现了暑天纳凉的美好场景:“假使盘石上,翻涛沃微澜。漱流复濯足,前对钓鱼翁。贪饵凡几许,徒思莲叶东。”诗人在水边吹着凉爽的风,光着脚丫子踏进水里嬉戏。让人羡慕的不仅是诗人难得的纳凉处所,更是诗人闲适平和的心态。

所以中唐的白居易在《苦热题恒寂师禅室》一诗中写道:“人人避暑走如狂,独有禅师不出房。可是禅房无热到,但能心静即身凉。”据说,当时白居易到洛阳的寺庙拜访恒寂大师,正值酷暑时节,白居易大汗淋漓,却看到恒寂大师安静自如地端坐在闷热的禅房内。白居易惊讶地问禅师为何不换个地方纳凉。恒寂大师淡然答曰:“我觉此地甚凉。”白居易由此醒悟:“心静即身凉”。今天,当我们吹着空调,吃着冰镇西瓜还觉得凉爽时,不妨学学古人的智慧,平静一下燥热的心吧。

■ 影像空间

「癫狂」姜文眼中的北平旧事

曾念群

和姜文此前大多数作品类似,《邪不压正》难逃褒贬的两极,喜欢的人奉若中国版昆汀,不喜欢的人嗤之以鼻。个人以为,《邪不压正》依旧保持着浓烈的姜文印记,其水准在《一步之遥》之上,《让子弹飞》之下,它比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来得浓稠油腻,却比《太阳照常升起》更加通俗易懂,它适合反复观看,且每一遍都能给予你新的发现。

《邪不压正》塑造了一个城墙上人力车奔跑、城墙外火车飞驰的老北平,那正是梁思成心心念念的北京城——电影处处埋伏着关于民国旧事的彩蛋:片中提及北平安防机构所在的东棉花胡同39号,正是姜文母校,今日中央戏剧学院的所在;影评人提及的“吾师庄士敦”系溥仪的外籍老师,同时也是奥斯卡影片《末代皇帝》的原著作者;片中彭于晏到协和医院上岗第一天,宣誓时所面对的肾,也有这么一段逸闻:当年梁启超要做左肾结核手术,协和院长却错把健康的右肾切除,导致了梁启超的英年早逝……

相比这些埋伏着的小彩蛋,个人更偏好故事人物的背景由。除了蓝青峰与电影原著《侠隐》作者张北海的父亲张子奇的对位,我们还可以从女主角关巧红身上找到民国第一女刺客施剑翘的投影。施剑翘乃奉系第二军军长施从滨之女。直奉大战时,施从滨被孙传芳俘虏后枭首,示众三日。为了替父报仇,施剑翘通过手术康复缠足,开始练习枪法,并于1935年击毙孙传芳。影片中关巧红之父被枭首示众三日,她曾寄望前夫复仇,通过手术康复缠足等细节,均与民国第一女刺客施剑翘的故事吻合。

对于喜欢传统文化的人来说,他们看到了屋顶上的北京,白雪皑皑的北京,一方风物的北京,底蕴深厚的北京,血色残阳的北京,烽火狼烟的北京,国仇家恨的北京,以及业已消失的北京……

稍微资深一点的影迷,可能从中看到更多。有人从屋顶少年彭于晏身上看到李安《卧虎藏龙》中玉娇龙的影子,有人从许晴的香艳与情义联想到《太阳照常升起》里的陈冲,有人透过周韵缥缈绰约的风姿,看到复仇女神《聂隐娘》,有人甚至从廖凡的阴狠与毒辣里看出了昆汀《无耻混蛋》的味道。其实不必强行为姜文贴上任何类比的标签,姜文从来都是一个癫狂不羁的自己,不妥协的自己。中国电影有太多的逢迎与圆滑,唯独癫狂与不羁不可效法。

喜欢姜文的人往往不是因为他的完美无缺,而是他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。这一次姜文的电影和高铁一样又提了速,剪辑也变得凌厉起来,镜头的运动加上人物的腾挪,合着蒙太奇的跳跃,有时跳转得突然断弦,但瑕不掩瑜,导演的“癫狂”纠结着人物的癫狂,最终引领观众“癫狂”到底。这个时代已经很少有导演执迷于用电影语言来拍电影,而姜文即是这少数派之一。

当然,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,对于“黑白无常”的姜文来说,可能另有所指。《邪不压正》是姜文“民国三部曲”的终篇,从《让子弹飞》到《邪不压正》,姜文经历过《让子弹飞》的牛气冲天,也经历过《一步之遥》的云端坠落,《邪不压正》的反响相对中庸,却依旧延续着鲜明的姜文印记。“民国三部曲”虽然告罄,但愿姜文的癫狂不会就此止步,中国电影如果没有了翻滚的姜文,将损失一份生气。



■ 摄手作

对斜阳

(本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)



杨奕华摄

科学精神
他们的

60年前,他们在青藏高原谱一曲“行路难”

杨雪

“你挑着担,我牵着马……敢问路在何方?路在脚下。”家喻户晓的西天取经磨难,对老一代青藏科考人也特别适用。

前不久,一次采访的机会,笔者见到了86岁的孙鸿烈院士。在老人的娓娓讲述中,笔者随着他回到了五六十年前,还没什么公路覆盖的青藏高原。新中国的科研人员首登青藏高原,是骑着马去的。1951年,50多位科学家和科研助手组成工作队,骑着马、骑着车进军西藏,用两年时间完成了西藏东部地质调查、西藏农业考察报告。此前,中国人对这片占自己国土面积四分之一的区域,在科学认识上是一片空白。

孙鸿烈第一次进藏是1961年,当时科学院百余人为修青藏公路做冻土情况调查。孙鸿烈走到拉萨、日喀则的河谷地区,沿着拉萨河、年楚河寻找荒地。他是研究土壤的,那次还带着任务,为西藏老百姓找荒地、发展农业。

河谷之下,山川之巅,就这样零星有了中国科学家的身影。他们跋山涉水、翻山越岭……上世纪50年代末,“冰川之父”施雅风院士开始组织冰川考察研究;1966年,“黄土之父”刘东生院士组织了珠穆朗玛峰地区大规模科考,“欲渡黄河冰塞川,将登太行雪满山”,李白笔下的行路难,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。

尽管历经艰辛,能做的工作还是非常有限。当时查到的文献零碎都是英国的,对于这片我们自己的国土,孙鸿烈直言,我们做的工作太少。为了给国家争光,给民族争气,中科院成立了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,做了十年规划,前4年的考察区域是占青藏高原一半面积的西藏自治区,然后再到可西里和川西地区。西藏地区的科考工作由孙鸿烈主持。科考队给孙鸿烈配了一辆212吉普,但他不坐,跟大家一起坐解放牌卡车。过了日喀则就没有公路了,吉普车沿着被军车趟出的路在前面开道,卡车跟着慢慢晃,基本不用担心陷入坑里的情况。但遇到过河就麻烦,很容易陷在河里动不了,这时全车人就得下河推车。要穿着鞋,否则扎脚,然后上岸湿着冻一天,晚上住下了,再用热水烫烫脚。

从1973年到1976年,从西藏东部的林区到西部的荒漠,孙鸿烈记不清在哪、推了多少次车。回忆起野外考察的4年时光,他甘之如飴。他说,当时科学院系统对探索青藏高原这片未知土地有着热切的向往,一上西藏,大家都很高兴,争着去。

晚上,能住到部队的兵站或地方的运输站,就是最好的归宿。“站”相当于招待所,虽然

并不具备什么招待条件。孙鸿烈形容,那是一个大房间,双层大通铺,大家把自带的鸭绒被往上一铺,一个挨一个就这么睡了,一层能睡十几个人。

除了有瓦遮头,住站上还有一个好处,就是吃饭。站里提供大锅菜,还有米饭馒头;他们也带着高压锅,有时候自己煮点粥。白天出野外工作,中午只能嚼压缩饼干,喝水壶里已经凉掉的水,晚上回到站上,能吃口热乎饭就特别开心。

当然,更多时候,大家只能住在野外,因为考察深入农区、牧区甚至无人区。他们支起一个个带底儿的,里面正好摆一张鸭绒睡袋的人字型厚塑料帐篷,拿出跟老乡买的牛粪,在涓涓流水的河边,在野云万里的山边升起炊烟。

孙鸿烈的野外工作主要是“挖坑”。他们带着铁锹,在有代表性的植被、地形等处选好点,挖出一个土壤剖面,然后一个人下去分层。一般分为A层有机质层、B层过渡层、C层母质层。地表水淋洗石灰到B层,分层人用盐酸可以测出碳酸钙。西藏的土壤一般不超1米就能挖到C层,两三个小时即可完成一套从挖坑到剖面的工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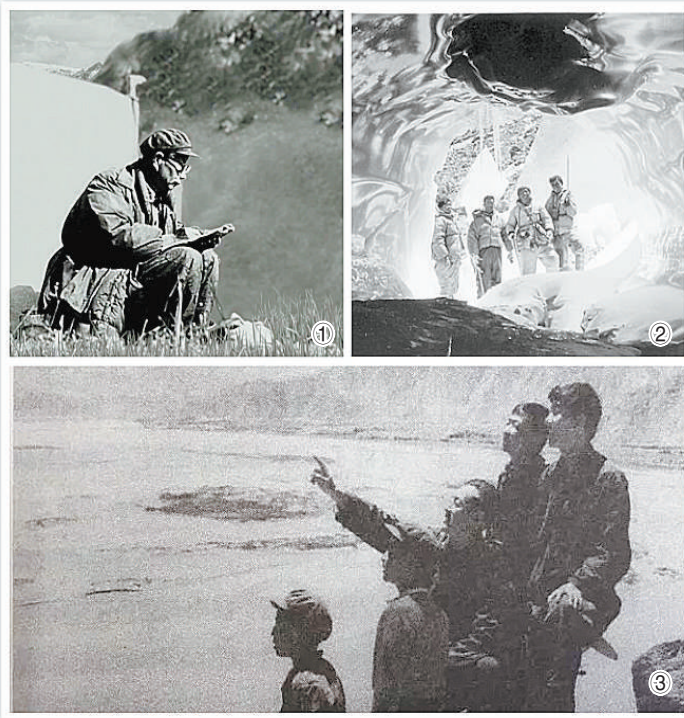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随身带着纸盒,里面分好几格,分层取土壤样本后按层放进去,做成纸盒标本。还

会用布袋装土,一袋约一两斤,背回实验室,机械分析确定粗细等物理性质,化学分析确定成分。如果要取整段土壤剖面,就要用木盒子,很重,要有车开到样本坑附近。老乡只知道这是阿嘎土,那是巴嘎土,科研人员要知道究竟是什么土。

由于整个青藏高原没有任何科学记载,科考队要对土壤、植物、昆虫、地貌、水文、冰川、气象等一一摸底,各学科之间还有交叉、结合。1973年进藏时科考队40多人,到1976年壮大到400多人。回来经过3年总结,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版了34部、共43本文献,分类很细,比如植物志就出了5本。

第一次青藏科考是一次主要靠人力完成的科学大发现,科考队员则是新中国第一代“户外达人”。因为科研需要,他们不得不在青藏高原上“玩户外”,然后“玩”出不少院士,还“玩”出一个大奖——1987年,“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影响的综合研究”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。

搞青藏研究的人都有着无可救药的青藏情结。耄耋之年的孙鸿烈,去年又去了藏东南,考察地质灾害。这次他专门坐车感受了一下墨脱公路。1974年,他从雅鲁藏布江的“大拐弯”徒步走到墨脱,用了3天时间。



图① 1964年,刘东生在希夏邦马峰考察。

图② 1964年,施雅风(右二)在希夏邦马峰考察时于冰洞前留影。

图③ 1973年孙鸿烈院士(中)率队在雅鲁藏布江中游考察。

扫一扫
欢迎关注
嫦娥的秘密
微信公众号

